

# 投射之“屏幕”与反观之“镜子”

——对中国英语教育三十年冷热情绪的思考\*

北京大学 高一虹

**提 要:**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现代化进程中,英语教育激发了各种强烈的情绪情感,包括:以八九十年代为代表的“多快好省”激情与亢奋,与其相联系的是经济腾飞、发财致富的强国强己之梦;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变得突出的“费时低效”焦虑与沮丧,因英语的学习成就与期待目标相差甚远;世纪之交开始,在包括近期“英语退出高考”政策酝酿等事件中凸显出的担忧与恐惧,与其相联系的是母语和母语文化认同被蚕食的威胁。这些不无矛盾的情绪情感体现于语言教育政策制定者、教育机构、学习者诸多层面的话语之中;蕴涵在矛盾之中的是国人持久的心理情结,即对文化认同的维持与扩展、对西方文化的崇拜与憎恨。英语教育像是一块屏幕,在其两面投射着我们的爱与恨。这一心理情结植根于鸦片战争以来的社会历史情境,同时也通过话语不断被再生产和自我固化。在当今全球化的情境中,这块屏幕或许应该转变为一面镜子,供我们反观矛盾的认同需求。在清晰的觉察之下,我们应能放下一些忽冷忽热的“疯狂”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用开放性、对话性、创造性的心态对待外语与母语教育,达到“1+1>2”的“生产性”效果。

**关键词:** 投射之屏幕; 反观之镜子; 中国英语教育; 心理情结

## 1. 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总体上也是中国“英语热”的三十年。不过热中有冷,冷热交叠,忽热忽冷。也就是说,国人对英语学习倾注了强烈而矛盾的喜怒哀乐。这些情绪情感<sup>①</sup>像钟摆一样重复着自己的起伏变化。本文将讨论几大类情绪情感——激情与亢奋、焦虑与沮丧、恐惧与担忧。文章将摘举语言教育政策制定、教育机构(包括学校和社会培训机构)、学习者层面的话语,以呈现这些情绪情感,进而将这些情绪情感置于鸦片战争以来的社会历史情境之中,探讨和挖掘其原因和规律,以及英语教育对于民族认同建构的意义。结尾部分简略讨论全球化背景下新出路的探索。

## 2. 中国英语教育的冷热情绪

### 1) 激情与亢奋

中国的“英语热”——对英语教育和学习的激情与亢奋,生发于经济腾飞、发财致富的富国强己之梦。在闭关锁国的时期结束、中国迫不及待地打开国门、实行改革开放之时,“多快好省”地培养外语人才、学好英语,成为紧迫的社会需求,

甚至上升到政治成败的高度。

政策话语: 1978年1月18日,教育部颁发《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计划试行草案》,规定有条件的学校外语课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开设,八年内外语课共1080课时。2月17日,国务院转发教育部文件,北京外国语学院和上海外国语学院恢复为重点院校。3月4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决定当年选派300名左右出国学习和进修人员。

1978年8月29日至9月10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和中科院副院长周扬在会上讲了话。这次会议被认为“是一次拨乱反正的会议,是‘文革’以后第一次全面研究和规划外语教育的会议”(《要事录》: 135)。会议认为,“当前,多快好省地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外语人才,使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其他专业人员尽快掌握外语工具,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就是贯彻党的方针。……学不好外语不仅是业务上的失败,而且是政治上的失败。”(同上)

对英语教育的政策性热情,三十年来基本持

\* 陈向明、周燕、田剪秋、肖琳、王景云等同仁对本文初稿提出了宝贵的反馈意见,特此感谢。

<sup>①</sup> 通俗地说,情绪和情感是喜怒哀乐等人的主观体验。根据普通心理学的定义,“情绪和情感都是人对客观事物所持的态度体验,只是情绪更倾向于个体基本需求欲望上的态度体验,而情感则更倾向于社会需求欲望上的态度体验”(百度百科)。不过本文在讨论社会群体的态度时,多将群体当做个体分析,故未严格区分情绪与情感。

续着。例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北京市政府成立了“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织委员会”,推行了“市民讲外语活动”,向各行各业发放《北京市民讲英语手册》。从出租司机到街道的大爷大妈都被卷入了讲英语活动,尽管映证其实际效果的学习者话语并不多。

教育机构话语:1980—90年代,本着多快好省的精神,英语的学校教育突飞猛进,在教学大纲制定、英语专业的恢复和扩大招生、英语教育状况研究等方面,生产了大批政策、宣传和学术话语(参见《要事录》)。而民间培训机构的话语则更突出地体现了社会对英语的热度,“疯狂英语”是其代表。

李阳于1994年组建了“李阳国际英语推广工作室”,以其“大声喊出英语句子”的“疯狂”风靡全国。在张元1999年拍摄的纪录片《疯狂英语》片首,李阳带着一群人在雪地里一面走一面振臂热烈呼喊“Crazy world! Crazy study! Crazy English! Crazy everything! Crazy everyday! I love this crazy game! Crazy! Crazy! Crazy!...”(疯狂的世界!疯狂的学习!疯狂的英语!每事疯狂!每日疯狂!我爱这个疯狂的游戏!疯狂!疯狂!疯狂!……)

“疯狂”的话语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其意义似超越英语学习本身。“‘疯狂’代表着人类超越自我的精神,代表着对目标和理想的执着追求,代表着对事业和使命的全情投入,代表着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激情。人一旦有了这种疯狂精神,做任何事都可以成功!”除了个人自信的提高,“疯狂英语”的理念中还融入了国家的梦想。“李阳疯狂英语的两大使命和梦想是‘让三亿中国人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和‘让中国之声响彻全世界。’”(百度百科)

相似的培训机构还有“新东方英语学校”。该校由俞敏洪创办于1993年,目前据称年培训学生45万人次(百度百科)。与“疯狂英语”相似,“新东方”也将提升学习者自信作为其精神,宣传口号包括“优能—Yes, you can!”“传递自信, yes, you can!”新媒体时代,充分迎合“YOU一族”主角们的自我意识和自主意识,……书写信念、表达激情”(同上)。俞敏洪已成为“屌丝”走向成功的精神符号——“从农民的儿子到北大教师,从一校之长到精神偶像;使穷教书匠成为百万富翁,

使万千学子走向成功”(卢跃刚2002:题头)

不难看出,在李阳、俞敏洪这些英语成功人士身上汇聚了Bourdieu所说的多种形式的资本,不仅有作为文化资本的语言技能本身,而且还有经济资本(百万富翁)、社会资本(社会地位)、符号资本(精神偶像)(Gao,2009)。正是这种资本的丰富性激发着人们的疯狂。

学习者话语:在沈莉霞等(2004)的调查中,“疯狂英语”的学员对“疯狂”的解读与其机构话语高度一致,“是一个褒义词”,指的是“为了追求某种目标,看上去有点痴迷或者说有点走火入魔”;是“高强度”、“极度的投入”;“这样肯定能够成功”;“疯狂”即“偏执”,而“偏执”就是更具“感染力”、“冲击力”的“执著”。

十年后,在回应“李阳疯狂英语怎么样?”的网帖中,仍是多数人点赞。网民“Q不想长大”说“兄弟们,一定要记住:……当有人在你背后说你是疯子、傻子的时候,你的英语就成功了。……疯狂英语适合所有的穷孩子,更顺应了当代英语发展的现状,是英语全民教育的一种潮流。……加油吧,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全天下所有的英语爱好者与你同行!……我们应该值得庆幸与感恩,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拥有李阳的时代!”<sup>①</sup>

政策制定者的“多快好省”、培训机构的“疯狂”、学习者的“偏执”,这三种话语高度一致,相互呼应,呈现出对于英语的狂热激情和亢奋。

## 2) 焦虑与沮丧

与高度激情相联系的是对学习效率的高度期待,以及期待未满足所产生的焦虑和沮丧。在政策话语层面,焦虑话语的明显标志是九十年代中国政府领导人有关英语教育费时低效的评价;在教育机构层面,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实施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引起了广泛焦虑。

政策话语:李岚清副总理(1996)谈到“由于教学法不够得法,我国知识分子的总体外语水平不但不如发达国家,如德国,也不如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尼、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等,这不但成为我们吸收别国先进科技文明成果、对外开放和交流合作的一大障碍和弱点,也是我们吃亏之处。”在1996年

<sup>①</sup> <http://zhidao.baidu.com/comment/71766daf7901b14101e1d00c.html?attitude=0#comments>, 2013年11月8日上传。

6月28日的外语教学改革座谈会上,他说“我国目前的外语教学水平、教学方法普遍存在费时较多、收效较少的问题,亟待研究改进。”之后教育部高教司外语处处长岑建君(1998)也谈到“我国外语教学与经济、科技发展要求之差距逐年扩大。……由于我国大学生外语水平过低,严重影响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进度。”(转引自蔡基刚,2006:4)

教育机构话语“费时低效”激起了社会反响和教育界的争鸣。外语教师井升华等1999年3月10日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抨击英语教学“是一壶烧不开的温水”。《中国青年报》就此问题于1999年3月28日组织了外语教学改革座谈会,会上外语界人士发表了不同看法(蔡基刚,2006:27)。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戴炜栋(2001)认为“我国英语教学……最为突出的是‘哑巴英语’和英语学习的‘费时低效’现象。”另一些英语教育专家认为“费时低效”、中国英语教育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落后的提法过于简单。如胡壮麟(2002)指出,“我们的学生是把英语作为外语,而不是第二语言来学习的。”

“疯狂英语”的时代呼吁“疯狂考试”。1980年代,中国英语教育走向了全国范围的标准化考试。由国家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主持的全国性教学考试“英语四、六级考试”自1987年正式实施。虽然教育部并未将四级考试与学位授予联系在一起,但这项考试十余年中不断发展壮大,学生的四级通过率成了衡量学校档次的不成文的标准,不少高校制定了将四级考试通过与学位挂钩的“土政策”,并用奖罚措施刺激英语教师提高学生的四级通过率。英语考试焦虑在学校、教师、学生中蔓延。2005年2月,教育部宣布对英语四六级考试进行改革,不再发放合格证,改为发放成绩单,并重申教育部从未要求四级与学位挂钩。不过直到近年,一些高校的政策仍将四级通过与否与学生毕业挂钩。<sup>①</sup>

学习者话语:不少学生不得不为考试疯狂。一位网友说“在为高考奋斗了3年后,我不得不在大学里继续痛苦,因为我的头上正用头发丝悬挂着英语4级这把大刀,它随时可能掉下来,砸中我本来就已经并不挺直的脊梁。按照北京人事局的规定,要想在北京工作,必须拿下英语四级证

书。而按照不成文的规定,要想在大海般的人才市场找工作,英语六级证书更是必不可少的砝码。……大学四年里大多数时间都在为英语发狂……大学基本上就是读了英语。考过四级也放松不了,因为还想考六级,六级的通过率很低;还有读研,英语都是难迈的槛儿——不要问我的专业,专业哪里有英语重要?考研读博,专业课成绩不是决定录取的最重要的因素,而是英语。今年我考研,导师招5个人,我的专业课成绩排第二,但仍然惨遭淘汰,只因为英语差了0.5分”(朱鲁子等,2004:140—142)。在近期一项跟踪调查中(高一虹等,2013:122,157),一位理工科学生在访谈中说:“(四级)差一分没过,把我憋屈坏了……觉得受刺激了……就是因为四级没过么,然后奖学金没拿着。选了一个校级优秀班干部,也因为这个,就是学校不批。然后后来又奥运会志愿者,也不行,就不让参加考试,哎呦哎,当时崩溃了!”一位文科学生在学习日记中写道“灰蒙蒙的四月刚走,令人痛苦的六月又来了。从去年12月到今年6月,英语考试一个接着一个。我真是焦虑啊!四级让我郁闷,催白了头发,把我变成了圣诞老人。专四的打击把我彻底变成了四月的愚人”。

尽管在教育界存在不同的声音,焦虑不满的情绪在各层面话语中具有一致性,且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而负面的“费时低效”与正面的“多快好省”话语反向呼应,展现了国人对英语教育的极高期待和期待落空时的极大心理落差。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多快好省”的亢奋,就没有“费时低效”的沮丧。

### 3) 担忧与恐惧

担忧和恐惧也是与英语相关联的重要情绪,指向民族身份认同的弱化乃至丧失。有时,与担忧和恐惧相伴的还有民族主义的愤怒。约从世纪之交开始,往往因为某个社会事件的引发,这类情绪的表达变得明确和强烈了起来。例如,1999年5月8日北约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使馆,激起国人强烈谴责,大学生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抗议。部分学生提出罢考托福、GRE,北京大学校园出现了“不考托不考G,一心一意打美帝”的标语。时隔十多年,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2012)收录了部分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亦激起民族主义情绪。百余位学者联名举报称其违反《国家通

<sup>①</sup> <http://news.qq.com/a/20131104/016667.htm>

用语言文字法》破坏了汉语言文字的纯洁性,引起争鸣。而起始于2013年目前仍在进行的中高考政策改革,再一次触动了国人敏感的神经。

政策话语: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根据中央政府的精神,2014年前后各地纷纷出台或酝酿出台中高考改革方案,“英语降分、语文增分”,“突出语文作为母语学科的重要地位”;英语考试“社会化”成为重要内容。如北京市的征求意见方案包括高考英语分值由150分降低到100分,语文分值由150分提高到180分。<sup>①</sup>

2014年5月9日,一则全国中高考改革方案的消息在网上盛传,其中“2016年起英语正式退出新高考”成为爆炸性新闻。“1)2016年,英语将正式退出新高考,但是学生的会考成绩计入高考总分,学生可以多次报考会考,最终以最好成绩为准。2)在2016年之前,高考英语分值逐年降低:2015年,英语120分,相应的,语文将提高到180分;2016年,英语100分(会考),语文提高到200分。”<sup>②</sup>不过这一方案未得到官方证实,“多位参与高考改革方案制订的专家对记者表示,我国高考方案还在酝酿中,尚未公布。”<sup>③</sup>

这一酝酿中的方案最终并未出台。2014年9月3日,《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正式发布,规定“保持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科目不变、分值不变,不分文理科,外语科目提供两次考试机会。”<sup>④</sup>

从英语“退出高考”到“一年两考”,英语教育的温度欲降未降,政策话语的焦点也有很大变化,从“英语学科突出实际应用,回归到学科应有的位置”,“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考查,充分体现语文作为母语学科的重要地位”变为扭转“一考定终身使学生学习负担过重”。这一轮英语“退出高考”、“降分”的改革宣告流产。

教育机构话语:回首2013年底至2014年上半年,教育培训机构以及学习者、普通网民对英语

“退出高考”、“降分”政策的态度,可看出这一潜在政策引起的反响和遭到的阻力。

社会办学机构新东方表示欢迎改革。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在2014年3月3日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前表示,支持高考英语降分。只要英语分占高考总分的一个绝对值,哪怕降到20分,“人们还会为那20分而拼命学习”。不难想象,英语考试社会化可能给新东方这样的社会培训机构带来巨大商机。

学校外语教育专家对改革多持异议。上海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蔡基刚在《文汇报》(2013年12月12日)发表“高考改革后,英语怎么办?”提出改革应“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放在国家乃至国际大环境中综合考量”,提高而非降低英语教育和考试的标准。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程晓堂(2014)撰文强调基础教育中英语教学的重要性,指出了“使英语回归其工具性”的片面性,做出了英语之“有用”有别于“实用”、“将来有用”有别于“现在有用”等观点辨析。2014年6月14日,上海外国语大学《外国语》编辑部与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联合举办了“外语高考改革论坛”。在论坛形成的共识观点基础上,2014年7月20日,陈琳、胡壮麟、程慕胜、戴炜栋等15名英语教育专家联名给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写了“关于国家外语战略以及外语高考改革的建议信”,强调外语教育对于国家战略的重要性,提出了四点建议,包括“就外语高考改革开展论证和听证工作,全面论证外语高考实行社会化考试和多次考试、调整外语分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这些改革可能带来的影响。”

学习者话语:网民对高考英语改革高度关注。在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新浪网联合举办的“2013年语言文字舆情十大热点事件评选”中,“高考英语降分”位居榜首。<sup>⑤</sup>其他网站也出现了相关讨论,议题包括科技和商贸对于英语的需要、贫富差距、减负等。英汉语文化的关系仍是热点议题。有人认为“拯救中华未来,当务之急是废除英语高考制”,也有人谈“英语的重要

① 巨人网 <http://gaokao.juren.com/news/201310/444408.html>

② 如,乐游网 <http://www.962.net/html/85113.html>

③ 新浪广东 <http://gd.sina.com.cn/qy/news/2014-05-10/07461150.html>

④ 法律图书馆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461340](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461340)

⑤ 新浪调查 <http://survey.news.sina.com.cn/result/87778.html>

性”。<sup>①</sup> 以下是对改革政策的部分对立观点:

正方: 当英语一路狂飙的时候, 中国的汉语言文化却显得有些步履蹒跚。

反方: 汉语和中国文化的问题跟英语没半点关系, 你自己步履蹒跚, 非要把别人也拉倒?

正方: 民族语言与外语的传承或学习, 总该有个轻重缓急之分吧?

反方: 典型的“两难推理”逻辑漏洞, 凭什么汉语外语只能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 好好的语言一定要扣上“民族”这个前缀来占领道德制高点, 这到底是有多不自信?

正方: 或多或少会给孩子崇洋媚外的误导, 无法树立正确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在这样的背景下, 即使中国学子们个个学有所成, 却一心想着出国, 甚至移民。如此享受着中国的资源, 促进着外国的发展, 花着自己的钱帮别人养孩子, 我们大力投资教育的意义何在?

反方: 就相当于自己孩子喜欢去邻居家玩, 你却觉得问题出在孩子有腿, 打断了就不会跑了。这种鼠目寸光, 缺乏全球化时代基本常识, 夹杂着排外/仇外、民族主义的反社会人格自卑心理竟然又跳了出来占据主旋律, 真是令人叹息。

正方: 某种意义上说, 从全民英语热到冷静对待英语的地位, 谁说不是中国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呢?

反方: 明明都已经通过舆论造势, 政策打压, 还祭出了民族主义大旗, 就为了打倒英语这个莫须有的假想敌。这不是懦弱和自卑是什么?<sup>②</sup>

有关英语“退出高考”、“降分”的论争凸显了两种意识形态: 一种将英语教育看作母语和母语文化认同的威胁; 另一种将英语教育视为富国强民的必要手段。这类民族认同危机的言论和相关争鸣, 即便在英语热度最高的时期也一直存在。

“关天茶舍”网站约十年前就有“只有奴隶才去学习主人的语言!”的网帖。支持英语学习的网民, 也以“师夷长技以制夷”、“须咬牙切齿学英语”回应(Gao 2009)。本次改革之前几年, 英语降温的舆论呼声已经很高“英语已成为一个巨大的考试毒瘤”、“炮轰大学英语考试制度”、英语已成为毒害中国人民的“新式精神鸦片”、“英语入侵中华民族后, 经过了一个快速繁殖和变异的所谓‘英语热’过程, 今天, 已经走火入魔。我们认为, 中华民族正在经历一场由英语入侵所导致的新一轮的‘鸦片战争’”(朱鲁子等 2004: 11—12)。

对于母语文化认同丧失的担忧和恐惧, 深深印刻在各个层面的话语中。不过围绕“英语退出高考”、“降分”的论战和政策舆论变化, 可以较多看出层面内部的话语多元性和对立性、层面之间的差异, 以及层面之间的相互影响。

综上,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国人对于英语学习和教育的情绪情感跌宕起伏, 经历了以八十至九十年代为代表的激情与亢奋, 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焦虑与沮丧, 以及世纪之交以来尤为凸显的担忧、恐惧与愤怒。

### 3. 历史情境中形成并自我固化的心理情结

30年的冷热情绪交叠和矛盾, 需放在150年的历史情境中理解。在起伏变化的情绪之后, 是国人持久的心理情结, 即对文化认同的维持与扩展、对西方文化的敬畏、崇拜与恐惧、憎恨。这一情结形成于鸦片战争半殖民地的特殊历史情境之中。英语及西学的引进, 是在中国面对“船坚炮利”的列强侵略时, 做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选择, 以“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为原则。然而“体-用”之关系颇为复杂, 在之后的诸多历史时期, 体-用之争各有特点, 矛盾的心理情结不断被重复和强化(表1)。

表1. 英语教育在中国历史各阶段的地位(Gao 2009: 61-62)

阶段	时间	历史背景	英语的地位	“体-用”之关系	英语教育的特征
晚清	1861—1911	两次鸦片战争(1840s—1860s)暴露出中国保护自己不受西方侵略的能力严重不足, 中国人有强烈耻辱感	了解西方科学技术的工具; “师夷长技以制夷”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局限于为技术学习服务	见于为传播科学知识而建立的教育机构课程设置; 1903年之后见于中学和大学课程设置

① 新华网发展论坛, <http://forum.home.news.cn/thread/64304210/1.html>。

② 知乎 <http://www.zhihu.com/question/22224453>。2014年5月18日上传。

续 表

阶 段	时 间	历 史 背 景	英 语 的 地 位	“体-用”之关系	英 语 教 育 的 特 征
新文化运动	1911—1923	新文化运动(1917—1923)对儒学传统展开批判,并从西方引进了各种“主义”;汉语规范从古文转到白话文	探索西方哲学社会思想的载体	西学之“体”(各种“主义”)参与了中国社会文化转型	中学和大学课程设置
民国时期	1924—1949	在抗日过程中中国与西方结盟。执政的国民党力图得到美国支持,在一段时期内效仿美国的教育模式	与西方进行外交、军事和智性交流的载体	以(军事、外交、政治之)用为主	中学和大学课程设置
建国之后、文革之前	1949—1960	五十年代前期,中国与前苏联紧密结盟对抗西方,但这一关系在五十年代后期破裂	五十年代前期俄语地位大幅提升,英语地位大幅下降;五十年代后期趋势反转	“用”之地位起伏变化。出于政治原因英语失宠,但后期被视为对现代化有价值	50年代只有少数中学和大学的课程设置有英语;60年代初期在中学和大学课程设置有得到推崇
文革	1966—1976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教育受到冲击	英语被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联系起来;西学受到批判	如果说有“用”的话,是政治宣传的工具	从中学和大学课程设置有排除;后期部分恢复
改革开放	1978—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国加入 WTO	英语被视为现代化的重要工具	“用”的巨大价值;经济发展之工具	在中学和大学课程中占有重要比例

由历史回顾可见,英语教育在中国的地位、主流文化对于英语教育的态度,一个半世纪以来在高低褒贬之间钟摆式地往复摇摆。英语及其教育已经超出了其现实功能的意义,它像是一张屏幕,其两面投射着国人矛盾的情感。英语对于国人已成为一个符号,确切地说是符号的能指,其所指有两个,一个是现代化的理想,一个是民族文化身份的丧失。我们逐渐形成了与这一符号不同所指相对应的两套话语、两种意识形态。于前者,英语是中国成为国际强国的重要工具;于后者,英语是侵蚀汉语母语和母语文化认同的杀手。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随着国内政治、国际关系和社会形态的变化,这两套话语交替占据上风;在同一大的发展时期,也会因社会内部不同力量的角逐而发生话语交锋和更迭。政府、教育机构和学习者通过话语的传播,对这个心理情结进行着自我固化和再生产。矛盾的情感和冷热摇摆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惯习”(habitus)(Bourdieu, 1991),即生产结构的结构。百余年前的鸦片战争是真实、外在的,而今天抵御英语“精神鸦片”的“鸦片战争”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主观建构:植根于历史创伤的心理情结,使我们自己强迫性地生产出想象

的敌人,通过重复创伤维护并不坚实的民族认同。

形成于历史的情结,应还原到历史情境中去理解,看到其必然性的一面。“屏幕”本身并非完全透明,它有历史留下的真实印记,而全球化进程将激活这些印记。在我国,英语教育不成为热点话题似乎反而是不寻常的,这说明它已经成为中国文化肌体内部一根实实在在的敏感神经。因此期待冷热症在短期内消除不大现实。然而,对于心理情结的历史性理解,并不意味着在冷热摇摆的重复之外已无选择空间。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旧有惯习未必仍是最有效的民族身份建构策略,新的出路亟待探索。

#### 4. 在全球化的情境中探索新出路

“全球化”是指“在以媒体、信息和传播领域为主的技术创新推动下,资本、商品、人员、图像、话语在世界范围加速流动,从而形成全球性活动、共同体组织和文化的新格局”(Blommaert, 2010: 13)。Fairclough(2006)将关于全球化的观点分为以下四种“客观现实观”认为,全球化是现实世界中发生的客观过程。“修辞观”认为,人们用有关全球化的呈现来支持特定观点的政策和行动;

“意识形态观”系统而细致地审视话语如何被用来支持占霸权地位的策略和实践“社会建构观”强调社会现实的社会建构特征,以及话语在社会建构中的意义,但不否认社会现实的存在。

用社会建构观看中国的英语教育,便会在承认历史真实性的同时,充分审视英语教育中的人为建构,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当下情境中的客观因素,向理想目标拓展建构策略。从这一视角不难看到,当今的英语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去领土化”成为国际交流的共同语(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在全球范围,英语教育的标准已经放弃“本族语者中心”,做出各种调整,例如以创造性的交流效能(capability)而非符合本族语者文化传统的交际能力(competence)作为培养目标(Widdowson 2013)。

如果我们承认英语可以“去领土化”,那么往日在半殖民地历史当中形成的防御机制和应对策略也就不再是当今必然和唯一的选择。母语和外语、民族文化认同的维护与国际身份的获得可以超越二元对立,以“1+1>2”的“生产性”态度来实现(Gao, 2001)。例如,与其讨论英语是否“退出”考试以让出空间给汉语,不如思考如何在英语教育中融入汉语和中国文化的表述、体认和传播。在不同教育阶段的教材教学中,皆可根据学生的语言和思维发展程度,示范和引导用英语描述中国文化的某个侧面。测试、竞赛等活动也不妨纳入此类元素。最近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汉字听写大会”,据说是受到了美国的英语拼写比赛节目的启发。以流行文化的方式来强化母语能力,是一个生产性的尝试。还可以创造更多的英语活动,如中华文化英译比赛、介绍家乡美景和历史的英语导游比赛等。在外语教育的观照下,或许还可反思和改进语文教学,深化学生对母语和优良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建立文化自信。

总之,与其将英语教育当作心理投射的屏幕,我们更应使其成为一面镜子,供我们反观自己矛盾的认同需求、情绪情感。屏幕上的投射多是无意识的、被动的,而镜子中的觉察是有意识的、能动的主体行为。在清晰的觉察之下,我们应能放

下一些固化的冷热摇摆和对立的思维方式,对话性、创造性地对待外语与母语教育;以平和而自信的心态,相得益彰地建构民族文化和全球身份的认同。

### 参考文献

- Blommaert, J. 2010.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CUP.
- Bourdieu, P.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J. B. Thompson ed.; G. Raymond & M. Adamson trans.) Cambridge: CUP.
- Fairclough, N. 2006. *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 Gao, Y. H. 2001.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1 + 1 > 2"*.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Gao, Y. H. 2009. "Sociocultural contexts and English in China: Retaining and reforming the cultural habitus." In J. Lo Bianco, J. Orton & Y. H. Gao (eds.). *China and English: Globalization and the Dilemmas of Identity* (pp. 56-78).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 Widdowson, H. 2013. "Competence and capability: Rethinking the subject English." The 11th Asia TEFL Conference, Manila.
- 蔡基刚 2006,《大学英语教学: 回顾、反思和研究》,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 程晓堂 2014,关于当前英语教育政策调整的思考,《课程·教材·教法》第5期: 58—64。
- 戴炜栋 2001,外语教学的“费时低效”现象,《外语与外语教学》第7期: 10—14。
- 高一虹等,2013,《大学生英语学习动机与自我认同发展——四年五校跟踪研究》,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胡壮麟 2002,中国英语教学中的“低效”问题,《国外外语教学》第4期: 3—7。
- 卢跃刚 2002,《东方马车——从北大到新东方的传奇》,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 沈莉霞、高一虹 2004,疯狂英语对于学习者的意义,高一虹等,《中国大学生英语学习社会心理》(第9章),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四川外国语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编,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审订,1993,《中国外语教育要事录》(简称《要事录》),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朱鲁子、杨艾祥 2004,《走火入魔的英语》,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100871 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

(文字编校: 徐江)

## Titles , Abstracts and Key Words

### A mirror for reflection vs. a screen for projection

— A critical reflection of changing emotions in China's English education fo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by Gao Yihong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intense emotions regarding China's English education in the past 30 year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economic reforms. These emotions include: 1) euphoria or "craziness" associated with a dream of becoming rich and prosperous, typical of the 1980s and 1990s; 2) anxiety and frustration due to the disparity between expected and actual achievement, prominent after the mid-1990s; 3) fear and anger, related to perceived threat to the native language and cultural identity, foregrounded in the new millennium, typically in the on-going national reform of entrance exam policies. These conflicting feelings are embedded in discourses of language policy makers,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individual learners. Behind such changing moods is a psychological complex of the Chinese, i. e., the mainten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and ambivalent attitudes towards the West. English education is like a screen, onto which are projected contradictory emotions. Such a psychological complex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sociohistorical reality of China since the Opium Wars. Yet it is also a result of self-perpetuation through discourse.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this screen of projection can be changed to a mirror of reflection, which helps to self-examine our conflicting identity needs. Such self-awareness will free us from fluctuating "craziness" and lead to more dialogical and creative approaches to foreign and native language education.

**Key words:** screen for projection; mirror for reflection; English education in China; psychological complex

### My thirty years of translat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s and my relevant observations

by Ulrich Kautz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the speech delivered by Ulrich Kautz at the conference "Mirror in Mirror: 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s and their translation" organized by the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in April 2014. Based on his own experiences and observations, Kautz discusses how to do a better job in introduc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o Germany and the role that translation can play in the effort. Specifically he tries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y would a German reader want to read a Chinese novel? Whose novels' German translations are available in the German market? What factors come into a German publishing house's consideration when it chooses a Chinese novel to translate? What criteria help a German translator to choose a Chinese novel? What are the common difficulties that German sinologists often find themselves in when they translate? What major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skills does Kautz often employ?

**Key words:** German translation; Ulrich Kautz; Chinese literature; 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 Mo Yan; Yu Hua; translation strategy; translation skill

###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L2 Motivational Self System, international posture, and intended efforts

by PENG Jian-e

**Abstract:** Drawing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at combines the theory of second language (L2) motivational self system and international postur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hree components of the L2 motivational self system, international posture, and intended efforts to learn English. Quantitative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1021 non-English-major college freshmen and sophomores who participated i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ult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how that L2 learning experience, ideal L2 self and international posture directly influenced intended efforts. L2 learning experience, ought-to L2 self, and international posture exerted direct influence on ideal L2 self, while L2 learning experience also directly affected international posture. Multi-group invarianc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L2 learning experience had a stronger effect on intended efforts while ideal L2 self exerted smaller influence on intended efforts among the participating sophomores than among